

· 综论 ·

数字时代社会保障体系的 工具理性批判与内生人民性探索

王 一

〔摘 要〕 伴随数字时代的来临，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备受挑战。从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出发，现代社会保障体系遵循资本增殖的工具理性逻辑，在实践中会引发忽视“人的主体性”的非理性后果。数字时代社会保障的工具理性逻辑一方面正在被生产方式和知识变革解构，另一方面在延续其非理性后果，导致社会保障体系需要面对工业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数字时代的冲击，以及二者的叠加效应。面对挑战，人的主体性复归为社会保障提供了发展方向，而内生人民性作为对人的主体性的继承与本土化发展，能够实现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复归。在实践中，可通过探索非正规就业者合作联社等形式，用内生人民性逻辑修正工具理性逻辑，探索新的组织基础和整合力量，完善数字时代的社会保障体系。

〔关键词〕 数字时代；社会保障体系；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内生人民性

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作为约束工业社会风险的保护性机制，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孕育出来的重大制度文明成果。^①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数字系统的不断拓展实现了信息存储、处理和传输的数字化，这意味着社会生活的“重新格式化”，不仅改变了我们沟通、协作和感知世界的方式，也对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颠覆性影响，社会保障体系备受挑战。面对挑战，我们应当更加积极地理解技术结构变动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研判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发生的变化，进行适时恰当的调整以适应数字时代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新要求，使社会保障体系继续发挥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作用。

一、马克思与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历史对话与时代意义： 工具理性的觉醒与悖论

现代社会保障体系起源于早期工业化时劳动者反抗性的社会保护运动，经历了济贫法时代、

〔作者简介〕 王一，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理论与社会政策。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互联网时代农民工‘零工经济’的社会保护研究”（21CSH068）。

① 郑功成：《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保障新制度文明》，《社会保障评论》2023 年第 1 期。

社会保险阶段、福利国家阶段及其后的改革阶段，成为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共识性选择。马克思的论著主要形成于济贫法时代的后期阶段，虽然没有对社会保障进行系统剖析，但仍有诸多同时代的思想交锋，为我们研究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当前我们对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的挖掘和阐释还不够充分，甚至存在一些误读，比如认为马克思否定社会保障、马克思并未论及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等，^①事实上，马克思对社会保障的论述是融入于其对社会制度的整体分析之中的，需要我们回溯到济贫法时代进行理解与阐释。

济贫法时代一般是指以 1601 年《伊丽莎白济贫法》（或称旧《济贫法》）、1834 年《济贫法修正案》（或称新《济贫法》）为标志，从 16 世纪下半叶延续至 19 世纪下半叶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萌芽时期。这一时期正值英国由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农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化进程迫使中下层农民与土地分离，不得不进行生存性流动。马克思在探讨资本主义起源时指出圈地运动加速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过程，这种原始积累方式“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地盘，使王地合并于资本，并为城市工业创造像鸟一样自由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②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而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城市工业部门却没有能力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被迫沦为“流民”，规模庞大的流民成为当时英国普遍而持久的现象。16 世纪末的伦敦有 20 万人口，其中流民就有 5 万人以上，流民通常以打零工和乞讨为生，还经常进行偷窃、抢劫等犯罪活动，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③在此背景下，1601 年，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政府颁布旧《济贫法》作为《工匠法》的补充，与其后的《斯品汉姆兰法令》《工厂法》等共同构成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旧《济贫法》以院内救济与院外救济相结合的形式开展济贫行动，尽管由于教区济贫能力有限、对贫困的麻木和冷漠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旧《济贫法》的效用，但从总体上说，英国近 16000 个济贫机构还是成功地使得乡村生活的组织架构免于破损和毁坏。^④

旧《济贫法》虽争议颇多，但在 17 世纪至 18 世纪中期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很多欧洲国家纷纷建立了类似的济贫制度。到 18 世纪 60 年代，英国工业革命迅速发展，机器对手工劳动的替代导致手工业者群体普遍失业，贫困问题愈加严重。更为根本的是，此时工业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自由劳动力，而旧《济贫法》以教区为基础的管理方式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工业社会发展与旧《济贫法》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此背景下，英国资产阶级在 1832 年议会改革中取得政治优势地位后，英国政府于 1834 年出台了资产阶级主导的新《济贫法》。该法案要求成立全国济贫工作管理委员会推行统一的济贫政策，改变了以教区为基础的济贫方式；法案认为贫困根源于穷人的道德堕落，因此取消了对有劳动能力的穷人进行济贫院外救济，穷人要得到救济就必须进入济贫院，而济贫院内穷人的生存状况悲惨不堪，他们失去自由、被剥夺政治权利，济贫院甚至被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⑤新《济贫法》的实施意味着劳动者要么以低廉的价格出卖劳动力，获得并不足以摆脱贫困的工资；要么进入以妻离子散、

① 许飞琼：《论马克思的社会保障思想及其时代意义》，《政治学研究》2013 年第 3 期。

②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63 年，第 809-810 页。

③ 丁建定：《论 17 世纪英国的济贫法制度》，《社会工作（学术版）》2011 年第 4 期。

④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 年，第 90 页。

⑤ 丛志杰：《对英国“新济贫法”的探讨》，《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5 期。

遭受非人待遇为代价的济贫院。不堪忍受的劳工阶层开始通过罢工、捣毁机器乃至社会运动的方式进行抗争，英国南部农业区、北部工业区持续爆发反对新《济贫法》的劳工运动。这些运动得到了恩格斯的关注，他指出，“在国家的这个措施中，英国资产阶级是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当权者出现的，在这里他们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真正愿望，表明了他们那种使无产者处处遭殃但又把这归之于个别人的罪过的恶劣行为的真正含义。这个措施不是出自于资产阶级某一集团之手，而是得到了整个阶级的赞许的。……这样就宣布了无产阶级是不受国家和社会保护的；这样就公开地宣布了无产者不是人，不值得把他们当人看待。”^①

马克思对济贫法时代济贫制度的批判同样尖锐，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保障的虚伪性和矛盾性。马克思认为当时的济贫制度使工人阶级陷入难以摆脱的普遍贫困当中，他指出，“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间，英国的租地农场主和地主把工资强行降低到绝对的最低限度，他们以工资形式付给农业短工的钱比最低限度还要低，而以教区救济金的形式付给不足的部分。……为了‘根除懒惰、放荡和对自由的奢望’，同时也为了‘减轻济贫税、鼓励勤勉精神和压低手工工场的劳动价格’，我们的忠于资本的埃卡尔特提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这些依赖社会慈善事业的工人，一句话，把需要救济的贫民关进‘理想的习艺所’。‘这种习艺所应当成为恐怖之所。’”^②“最近十年伦敦饿死的人数惊人地增加了，这无疑证明工人是更加憎恶贫民习艺所这种贫民监狱的奴役了。”^③马克思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只是资本主义生产与发展的一个存在条件，因为那些需要救济保障的贫民能够满足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时对劳动力的需求，“需要救济的赤贫形成现役劳动军的残废院，形成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它和相对过剩人口一起形成财富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一个存在条件”。^④但需要厘清的是，马克思对济贫制度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其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否定。马克思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⑤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正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功能。马克思也很重视《工厂法》等法案的积极意义，他认为，“英国的工厂法是通过国家而且是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所实行的对工作日的强制的限制，来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⑥马克思在论述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和著名的“六个扣除”理论时，更是直接肯定了社会保障“扣除”的必要性。

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在肯定社会保障必要性的同时，批判济贫法时代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由于济贫法时代劳工阶层面临的是两种困境的叠加，一种困境是劳工阶层要忍受资本家为攫取剩余价值而提高劳动强度、降低薪酬待遇（困境一），另一种困境是劳工阶层要承受工伤、失业等工业社会风险（困境二）。虽然这两种困境最终的表现形式都是劳工阶层的普遍贫困，

① 李钢、刘章仪：《恩格斯的社会保障思想及其现实启示——基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解读》，《社科纵横》2019年第12期。

②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60页。

③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18页。

④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0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79页。

⑥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67页。

但马克思能够一分为二看待，肯定困境二的客观性和解决困境二的必要性，并将解决困境一视为更根本、更彻底的路径，这体现了马克思面向实践的理性逻辑。反观济贫法时代的社会保障体系，当时的统治阶级显然对上述两种困境缺乏清晰的认识，仍然将贫困归咎于贫困者自身，既漠视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也没有认识到工业社会风险的客观性，反而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使社会保障体系成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手段，这必然遭到马克思的批判。

马克思对济贫法时代社会保障体系的批判根植于其面向实践的理性逻辑对工具理性逻辑的批判。济贫法时代正处于工具理性觉醒的阶段，工具理性追求客观、科学和逻辑，认为人类社会存在客观不变的规律并受其控制，是起源于“逻各斯精神”、以近代自然科学发展为基础、在启蒙运动中得到充分彰显的理性精神。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人类运用工具理性完成对传统蒙昧的祛魅，进而使工具理性覆盖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化进程就是工具理性扩张的进程。而马克思的学术思想正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工具理性所造成的异化或非理性现象的基础上展开的，马克思鲜明地指出工具理性的问题在于“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① 工具理性是一种以占有和征服对象和客体为旨趣的“主体性”。^② 在竞争性的市场关系中，资产阶级的工具理性以资本增殖为目标，通过对财产的占有体现“人的主体性”，这必然导致对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那么这种工具理性就是不公平且破坏生产力的，将会催生对人类生存条件而言是非理性的社会，是忽视“人的主体性”的。也就是说，以资本增殖为目标、通过财产占有体现“人的主体性”的工具理性（简称资本增殖的工具理性）在本质上是忽视“人的主体性”的，会造成非理性的后果。当然，马克思也吸收了工具理性的合理成分，认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③ 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理性逻辑吸收了工具理性的合理成分、同时克服了资本增殖的“工具理性”忽视“人的主体性”的缺陷，形成了面向实践的理性精神。

济贫法时代的社会保障体系以资本增殖的工具理性为基本逻辑，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最初的目的是解决流民引发的社会问题，其后为了适应和促进工业经济发展而调整，具有鲜明的社会控制和惩罚性功能。政府对贫民救济的关注从本质上不是出于救济不幸者的目的，而是为了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④ 马克思精准地判断了早期社会保障制度的性质，即充当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或手段，马克思对此是坚决批判的。但工业社会风险不是一种可以拒绝的选择，而是产生于不考虑其后果的自发性现代化的势不可挡的运动中。^⑤ 马克思并不否认这一点，面对“困境二”，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与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都需要社会保障，提出为劳动者建立相关后备基金的必要性，并指出这种扣除部分将在未来社会中显著增加，这当然是科学的预见，也应当成为我们分析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的基本出发点。

从马克思与社会保障的历史对话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作为一般规律的社会保障必要论和早期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页。

② 贺来：《“人类主体”：一种新型伦理主体的可能性——对“人类共同存在如何可能”的前提性反思》，《世界哲学》2024年第3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0页。

④ 丁建定：《试论英国济贫法制度的功能》，《学海》2013年第1期。

⑤ [荷] 沃特·阿赫特贝格：《民主、正义与风险社会：生态民主政治的形态与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资本主义社会保障的批评论，体现了其面向劳工阶层双重困境的实践的理性逻辑，是对济贫法时代忽视“人的主体性”的工具理性的批判和超越。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的核心在于，社会保障对各种现代社会形态而言都是必要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当从“人的主体性”出发、成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要环节。在其所处的早期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认为社会保障应当节制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而非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资本主义社会保障体系没有从“人的主体性”出发，资本增殖的工具理性逻辑必然产生非理性的实践后果，陷入工具理性与劳动者福祉相悖的困境之中。

济贫法时代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萌芽时期，马克思生前并未见证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确立与发展，但其社会保障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预判了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演变。在马克思逝世后不久，面对日益尖锐的劳资矛盾和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试图通过缓解劳工阶层的工业风险困境（困境二）来掩盖、模糊劳资冲突（困境一），先后通过了《疾病保险法》《伤残和老年保险法》等法案，法国、奥地利等国也纷纷建立各种社会保险制度，这标志着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正式确立了。社会保险从风险的角度处理社会问题，将疾病、年老、失业等都视为风险，而且这些风险在整体上是有规律的。工业社会以工业企业为核心，科层式的劳动组织方式十分严密，类似的工作环境和生活境遇使劳动者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和生活愿望，劳动者面临的社会风险具有较强的同质性，这意味着社会风险具有整体规律性，但对个体而言却是随机的，工具理性致力于通过缜密的逻辑思维和精细的科学计算来实现效率或效用的最大化。^①按照工具理性的逻辑，社会保障可以对社会成员不透明的同质性社会风险进行重新分配，运用测量、计算、预测等方法掌握社会风险的整体性规律，使所有社会成员既相互依赖又彼此独立，进而通过风险共担实现互利合作，风险共担与互利合作也就成为社会保障体系工具理性逻辑的表现形式。但风险共担与互利合作是在没有善意干预的情况下生成的安全和团结，既不是从“人的主体性”出发，也不关心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维护，更不考虑能否将个人团结起来形成合作的整体。因此，风险共担与互利合作的工具理性仍然未能摆脱忽视“人的主体性”的问题。

二战后西方各国进入福利国家阶段，福利国家将以税收为基础的集体进步和普遍福利视为社会保障的核心和宗旨，人们似乎看到了“人的主体性”复归的可能，社会保障体系得到了空前充分的发展。但福利国家的繁荣是建立在经济繁荣基础之上的，20世纪70年代末，“石油危机”及其后的经济滞胀使福利国家迅速陷入危机，当劳动者福祉与资产阶级利益发生冲突时，西方国家毫不留情地进行了“福利减法”改革，普遍采取加剧劳动力市场竞争、削弱社会保障的“应急性新自由主义”策略。^②自1979年始，高收入国家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制造业工人和非管理层工人的社会保障水平却停止了实质性的增长。^③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从确立到繁荣、再到改革的历程印证了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的科学性和预见性，西方社会保障体系的本质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而保护劳动者，在经济繁荣的情景中，忽视“人的主体性”的工具理性逻辑与劳动者福祉之间的矛盾暂时被掩盖了，一旦遭遇经济危机就必然会再次陷入工具理性带来的非理性后果之中。

① 董礼胜、李玉耘：《工具-价值理性分野下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变迁》，《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1期。

② 冯彦君、孙佳梅：《劳动用工“规制缓和”的正当性及其实现》，《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1期。

③ [爱尔兰]特伦斯·麦克唐纳等：《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83页。

在把握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我们将从中国经验的主体性出发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历史与现实。新中国成立初期正值西方福利国家兴起阶段,我国受苏联“国家保障”模式影响,为推动工业生产建立了以城镇劳动者为核心、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家-单位制”社会保障模式,表现出国家负责、单位(集体)包办、板块结合、全面保障、封闭运行的特征。^①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流动,“国家-单位制”模式难以为继,社会保障体系进入社会化改革阶段,国家为配合国有企业改革首先建立了城镇职工的社会化社会保险制度,而后将社会保险的范围逐步拓展至全体社会成员,形成了“职工-居民”二元社会保险制度。在社会保险制度不断发展的同时,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救助体系也逐步走向成熟,形成了以低保群体为主体的综合性救助体系。此外,残疾人福利、老年人福利、儿童福利等以各类特殊群体为核心的社会福利制度,以及住房保障、教育福利、养老服务等制度也在不断发展。我国最终建成了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在内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化改革过程中,我国及时吸取福利国家危机的教训,并受到福利国家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始终坚持“保基本”的适度发展理念,社会保障体系发挥了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性作用。

新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并非起源于劳动者反抗性的社会保护运动,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动选择。应看到,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是在与西方的交流和借鉴中建立起来的,工具理性不可避免地以风险共担与互利合作的形式影响我国社会保障实践。工业社会以工业生产为中心,与之相应,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以工业生产过程中的风险统筹为核心,遵循与贡献相对应的原则,通过风险统筹实现互利合作以保护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再生产,对于无法进入工业生产过程的社会成员形成的是“补偿性”的转移支付项目。最终,工具理性的非理性结果表现为生产性与非生产性、风险统筹与转移支付的分化,进而造成了我国职工社会保险和居民社会保险的分化。具体而言,我国社会保险制度中的“职工”通常是指正规就业者,职工与用人单位共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形成社会保险基金,补偿因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风险产生的收入损失。社会保险制度中的居民群体是指除正规就业者之外的城乡居民,具体包括未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非正规就业者、一老一小等城乡非就业者等,据估算我国居民群体规模至少9亿人。^②居民群体由本人缴费和各级政府补贴共同形成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一定程度上补偿参保者因养老、医疗产生的收入损失。非正规就业者可用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

① 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30年》,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页。

② 正规就业者是指从事连续的全职工作,与用人单位建立直接的、不存在其他中介机构的劳动关系。除正规就业之外的各种就业形式都可以被称为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和雇佣关系更加灵活多样,国际劳工组织将非正规就业划分为兼职就业、临时就业、临时劳务中介就业和自雇者四个类别。目前我国的非正规就业形式主要包括业务外包、人力资源外包、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务派遣、传统零工等,本文对非正规就业类型的划分即为上述五类。《2023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含退休职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保险者)约为5.21亿人;《2023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显示,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含退休职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保险者)约为3.71亿人;《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末全国人口总数约为14.10亿人。鉴于正规就业要求强制参保,根据上述数据推算,我国除正规就业群体之外的城乡居民群体规模至少9亿人。

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需个人负担全部缴费成本,个人负担水平远高于城镇职工。^①从待遇水平来比较,2023年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约为3162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月人均养老金约为214元,^②二者的待遇水平差距较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甚至远低于同期最低生活保障标准,^③难以起到防范养老风险的作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对于非正规就业者而言,虽然他们与正规就业者面临同样甚至更为严峻的工伤、失业风险,却很难被纳入职工工伤保险和职工失业保险范畴,“职工-居民”二元社会保险制度的非均衡性问题突出,风险共担与互利合作的工具理性产生了非均衡性的非理性结果,与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社会保障体系“统筹城乡、公平统一”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二、数字时代社会保障体系的新挑战:工具理性逻辑趋于瓦解

对于社会保障体系而言,如果说非均衡性是工业社会的结构性矛盾,那么数字时代所带来的就是整体性冲击。关于数字时代的社会学研究发端于20世纪70、80年代,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阿尔文·托夫勒“工业主义灭亡,新文明崛起”的第三次浪潮等研究探讨了数字化对工业社会的冲击、影响和预期。20世纪末,随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贝尔“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出现了再次赋予后工业社会时代意义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论,将信息社会视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特征,而将数字技术进一步拓展带来的人工智能、物联网、超级计算等科技和产业领域的变革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第四次工业革命引领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制定发展决策的重要依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④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估计超过12万亿元,占GDP比重10%左右。^⑤数字技术的不断拓展和深化正在推动人类社会形成新的文明形态,给工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颠覆性的冲击。

具体到社会保障领域,数字时代的影响既表现出外部现代化效应,又表现出内部现代化效应。^⑥数字时代对社会保障领域的外部现代化效应是指数字时代生产方式的转变和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对劳动者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外部变化给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机制带来挑战,当前最

① 以2023年7月至2024年6月北京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缴费项目为例,灵活就业参保人员每月需缴纳月缴费基数20%的养老保险和553.56元的医疗保险;而城镇职工个人缴纳养老、医疗保险比重分别为个人工资额的8%和2%,单位缴纳养老、医疗保险的比重分别为工资总额的16%、9%。按照月缴费基数上下限(33891元和6326元),灵活就业人员承担的两项社保月缴费分别是7331.8元和1818.8元,约为同等收入城镇职工的2.2倍和2.8倍。

② 《执法检查报告建议从五方面加强社会保险法实施》,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1/content_6984973.htm,2024年11月5日。

③ 《2023年4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4季度全国城市低保平均保障标准为785.9元/人·月,全国农村低保平均保障标准为621.3元/人·月。

④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年第2期。

⑤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3年)》,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官网:<https://www.szzg.gov.cn/2024/szzg/xyzx/202406/P020240630600725771219.pdf>。

⑥ [德]丹尼尔·布尔:《数字时代的德国福利国家:主要挑战与发展之道》,《社会保障评论》2019年第2期。

为典型的外部现代化效应就是非正规就业的迅速扩张及其影响。工业社会的社会保险制度是针对正规就业者的职业性社会保障项目，由建立劳动关系的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社会保险费，而数字时代自雇的劳动者和同时受雇于多个雇主的劳动者逐渐增多，这些劳动者没有雇主或者无法落实雇主责任，^①属于非正规就业范畴。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将非正规用工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互联网平台用工发展尤为迅速，互联网平台用工仅对劳动者在线的业务进行管理，将人员的线下管理分包给第三方或劳动者自己，形成了业务管理与人员管理相分离的“人员管理分包”模式，劳动者既接受平台的业务管理和在线劳动管理，同时也要接受线下第三方公司管理，这种双重管理模式使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判断劳动关系的标准失效。^②我国职工社会保险制度是建立在劳动关系基础上的，平台型用工由于难以判断劳动关系导致无法被纳入职工社会保险体系，这使得平台型用工的社会保险问题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

与外部现代化效应同时发生的是内部现代化效应，内部现代化效应是指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逻辑受到的冲击，表现出合作瓦解与风险异质的趋势。合作瓦解主要体现在组织结构的变革上，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企业资源再分配的过程，互联网赋权带来了新的“连接方式”，“个体”成为实践的关键词，令整个社会开始从科层制社会转变为“去组织化”的分布式社会、微粒社会，^③企业的组织结构也从过去的科层制串联式模型转变为扁平化、分布式的并联式模型，这种模式呈现由核心向外围的向心空间层次分化，由此形成的圈层壁垒、离心风险使企业联合劳动形态趋于瓦解。^④联合劳动形态的瓦解意味着劳动者的“去组织化”。如果任由“去组织化”趋势蔓延，包括正规就业者在内的劳动者都极易从合作的群体变为散在的个体，劳动者将失去团结合作的组织基础。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形成了新的权力关系，数字资本演变为自由流动的“经济利维坦”，不管距离多远都有能力高效率地实施行动，因缺乏局部化的协定或者即便有也可以轻易将其取消而能够自由运动。^⑤在这种新的权力关系中，权力以一种“不在场”的形式实施统治和管理，能够轻松逃避工业社会中劳资双方互相交锋、对抗的局面，也就无须顾及劳动者的反抗及后果。正如鲍曼所说，过去福特式工厂的雇员们可以运用他们的‘捣鬼’权利，迫使管理者们经过磋商通过一个可以接受的权宜之计，从而达成妥协。……而今，情况已不再如此，……对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弱者，要想使流动的管理者和变化无常的股东原地不动，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令人信服地展示自己的弱点和缺乏反抗能力来引诱他们到来并留下。^⑥劳动者“去组织化”与劳资权力关系失衡的综合作用将导致合作瓦解。例如，目前我国快递业建立了较为严苛的快递投诉制度，让快递员承担丢件等方面的一切风险，这事实上是把风险分配给了最缺乏议价能力的快递员群体，以维护快递公司利益与整个网络购物系统的顺畅运行，

① 何文炯：《构建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社会保障》2022年第2期。

② 杨伟国等：《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7-8页。

③ 微粒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夫·库克里克在《微粒社会》一书中提出，用于描述数字时代的一种新型社会形态，即整个社会高度数字化，所有人、事物、行为都被数据化，每个人都被清晰地识别，且彼此之间的差异被放大，每个个体都成为独特的“单体”。

④ 喻国明等：《分布式社会的再组织：基于传播学的观点——社会深度媒介化进程中协同创新理论的实践逻辑》，《学术界》2022年第7期。

⑤ [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33页。

⑥ [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9-30页。

这是数字时代成本最小、阻力也最小的方式，恰好说明数字时代劳动者面临着去组织化的风险，随之而来的就是失去与资本抗衡的能力，也就失去了互利合作的基础。

数字时代的风险异质主要表现在工业社会的同质性风险失去了相关性。信息大数据、医学遗传学使公众对差异性的了解越来越多，社会保障产生的“收益”和“损失”具有更大的可见性。当科学家能够越来越精确地评估个体行为、遗传因素与疾病之间的关系时，尽管风险依然存在，但不再是完全不可预测的风险，而是更加个性化的风险。如果家族遗传病的患病概率呈现明显的规律性，那么没有家族遗传病史的社会医疗保险参保者还愿意承担同等的缴费责任吗？如果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寿命，那么长寿风险何以分担？如果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引发疾病进而消耗社会医疗保险基金，那么保持良好生活习惯的参保者为什么要接受同样的费率？曾经具有群体特征的共同经历在数字时代变得差异化，这种差异化使得任何一个包罗万象的计划，无论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还是失业保险都不再具有群体的普适性，贡献者群体和受益者群体之间的分裂正在解构社会保障的风险共担逻辑。综上，合作瓦解和风险异质正在挑战社会保障体系规律性、同质性、组织化的基本逻辑，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存在被瓦解的风险。

综上，当工业社会迎来数字时代，社会保障的工具理性逻辑一方面正在被生产方式和知识变革解构，另一方面又在延续非理性后果，导致社会保障体系需要面对工业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数字时代的挑战，以及二者的叠加效应（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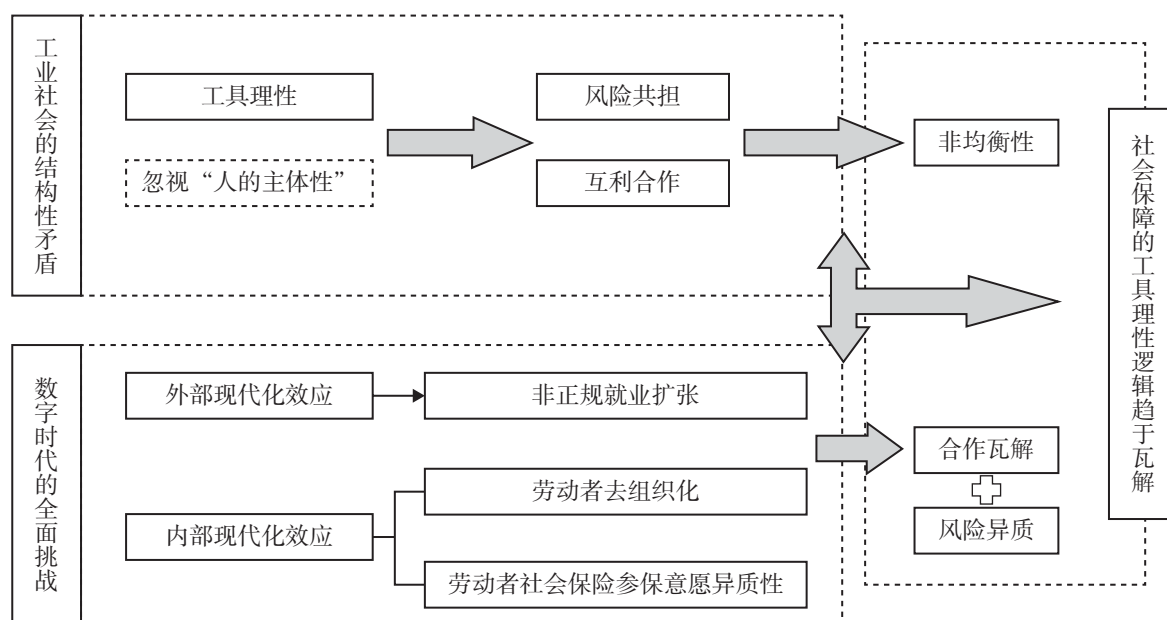


图1 数字时代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挑战

三、数字时代社会保障体系的逻辑转向：从工具理性到内生人民性

数字时代加速形塑了一个以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为特征的“乌卡（VUCA）”社会，^① 社会保障体系的工具理性逻辑正在

① 文军：《回到“不确定性”：社会风险研究的范式反变》，《浙江学刊》2023年第3期。

被生产方式和知识变革解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风险在数字时代会就此消失,在可预见的未来,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工资仍然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劳动者不得不面对因失业、疾病、年老等原因暂时(永久)退出劳动力市场、承受经济损失甚至陷入贫困的风险,而且这些风险是超出个人承受能力、必须通过社会化方式解决的,因此,我们需要探讨适应数字时代发展需求的社会保障体系。

工业社会中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逻辑是风险共担与互利合作的工具理性,马克思把从“人的主体性”出发作为发挥工具理性作用的基本前提,他曾指出济贫法时代资本增殖的工具理性存在忽视“人的主体性”的问题,如前文所述,工业社会以风险共担与互利合作为表现形式的工具理性仍然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因此,从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出发,面对挑战我们应当探讨“人的主体性”何以复归。马克思把人理解成实践的能动的人,充分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而且这里的主体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现实的人,因此主体表现为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在特定的客观活动结构的引导下,人的行为不断被总体化,人的个体主体性也就不断走向类的主体性。^①正是在类的主体性的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在践行“人民性”的过程中达成了“人的主体性”的复归,中国共产党基于“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地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并坚持至今,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彰显出鲜明的人民性。人民性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全过程。^②人民性既是实践的过程,又是在实践中不断摆脱环境和条件以及自身的种种羁绊而逐步获得自主、自由与创造、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的主体性不断得以充分展示的过程,最终在实践中获得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③

人民性的中国实践具有独特的“内生性”,这种内生性体现在传统民本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本位实践中。中国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对“民”之考察以集体为本位并在价值理念上凸显民生问题,不同于西方对“人”之考察以个体为本位和价值观上偏重于政治视角的传统。^④我们对“民”的认识既是集体的、具有群体实践性,也是民生的、具有现实效用性,因此,人民性是内生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当然,传统民本思想存在着前现代的历史局限性,既对尊君论有所制约,又未能脱出对尊君论的依附。^⑤而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本位实践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从君民到人民、从用民到为民的重构与超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就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我们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出发。”^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⑦党的二十大报

① 殷鸣放:《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思考》,《理论月刊》2009年第4期。

② 李友梅:《以人民性引领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③ 古小明:《论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江淮论坛》2004年第4期。

④ 姜锡润、王玉梅:《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人本思想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0年第8期。

⑤ 冯天瑜:《“民本”与“尊君”(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1期。

⑥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1095页。

⑦ 《习近平谈“人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月11日第1版。

告更是把“坚持人民至上”放在核心位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本位真正做到了从“人的主体性”出发,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既是实践的主体、又是认识的主体,既是创造主体、也是发展主体。因此,“内生人民性”植根于我国传统民本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人的主体性”的继承与本土化发展。

从内涵上来讲,内生人民性是以坚持人民至上为核心、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依靠人民为发展动力、以人民公平共享发展成果为宗旨、以人民为评判标准的中国式发展逻辑,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复归。内生人民性为中国话语体系内部各要素的自洽与互洽提供了可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人民性逻辑是区别于以往既有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因此,内生人民性应当成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根本遵循。数字时代的内生人民性具有流动性、互惠性特征。流动性是指数字时代人类以多媒体和互联网为载体进行信息交流的互通性、去空间化和去时间化。如有学者讲道,“欢迎来到这个没有疆界的世界,在这个万维网里,一切变为可能,变得等距,……宣告了距离的终结、语言的终结,甚至‘地理’的终结,就像人们曾经乐于预言的‘历史的终结’。”^①虽然流动性本身是中性的,既可能带来平等取向的去中心化,也可能引发数字鸿沟、数字垄断等问题,但充分的流动性必须具有互惠性,数字化生存使众多泾渭分明、不相往来的学科和企业一改先前竞争得你死我活、一损俱损的态势,开始寻求多方共赢的合作模式。失落已久的“共同语言”再次出现,让人们能够互相理解。^②各方需要建立持续性的密切连通,形成兼顾彼此的合作机制,以一种平等、互动、开放、共享的理念形成内生人民性。内生人民性有可能通过流动中的互惠形成良性循环,修正此增彼减的工具理性发展模式,通过不同于工具理性的方式提供有效的内生发展模式,将许多已经存在的实践联合起来,建构适应数字时代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也意味着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逻辑可能实现从济贫法时代资本增值的工具理性逻辑,到工业社会中风险共担与互利合作的工具理性逻辑,再到数字时代内生人民性逻辑的转换,开拓数字时代社会保障体系的新思路。

四、数字时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内生人民性探索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并要求健全“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这意味着我们既要解决非均衡性问题,也要对数字时代的挑战进行前瞻性的部署。我们应当从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出发,立足于内生人民性来探索社会保障的有效路径。内生人民性以合作互依、集体福祉、共建共享为准则,通过内生发展模式开拓数字时代社会保障体系的新思路,应对当前我国社会保

① [法]弗雷德里克·马特尔:《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疆域》,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329页。

② 李泉:《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障体系所面临的叠加性矛盾。具体而言,社会保障体系的内生人民性实践可以进行以下尝试。

一是建立非正规就业者合作联社。非正规就业的迅速扩张是当前我国社会保障领域最典型的外部现代化效应,且非正规就业者社会保险参保率明显偏低,社会保障体系需要通过新的组织基础将非正规就业者重新整合、吸纳进来。合作社是劳动者基于生产生活需要联合组建的互助性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劳动联合实现社员的团结发展,而合作联社是合作社联合社的简称,是若干个合作社在自愿基础上出资设立的联合型合作社。^①非正规就业者合作联社是内生人民性的具体实践,其宗旨在于提高非正规就业者组织化程度、实现非正规就业者的劳动联合。可由各级政府主导成立外卖骑手合作社、网约车司机合作社、家政员合作社等合作社,在此基础上形成非正规就业者合作联社,致力于将各种类型的非正规就业者组织起来,通过非正规就业者、用人单位、各级政府等多方共同积累形成互助保险基金,非正规就业者以合作联社社员身份参加职工社会保险,使社员享受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险待遇。合作联社还可以从事人力资源服务活动,提高非正规就业者的组织化程度、维护其社会保障权益,通过追求社员福祉与机构发展相辅相成践行内生人民性逻辑,实现“人的主体性”的复归。

二是探索社会医疗保险家庭联保政策。在企业联合劳动形态趋于瓦解的数字时代,家庭作为收入、消费和福利共同体应当成为实践内生人民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更多的社会保障职能。在社会医疗保险领域,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采用了以家庭为单元的参保模式,这种模式将参保范围从职工扩展至职工以婚姻和血缘为基础的家庭成员,根据工作和收入情况确定相应的医疗保险待遇。我国现行社会医疗保险政策要求以个人身份参保,在实践中造成了职工家庭普遍存在“一家多制”的情况,职工医保基金大量结余、迅速积累,而部分职工的非就业家庭成员仍然存在保障不足的问题,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均衡在家庭层面表现突出。家庭联保是解决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的有效切入点。李珍教授是国内较早提出医疗保险家庭联保政策主张的学者,并提出“二元向一体渐进融合发展”的观点。^②本文借鉴李珍教授观点,结合数字时代的新特征,提出在全民统一、强制参保的基础上形成以家庭为参保单元的医疗保险制度,即就业人口参保,家庭内的抚养(扶养、赡养)人口自动被保,达到就业人口缴费、一家老小受益的目标,抚养(扶养、赡养)人口的筹资来源包括政府财政投入、合理提高职工缴费比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改革形成的积累等方面。家庭联保能够增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实际受益人,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就会相应减少,为适度提高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贴额度和人均筹资水平提供可操作空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之间的差距将逐步缩小,最终实现二元制度自然融为一体,满足均衡且充分的双重目标。

三是探索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底线。社会保障底线的提出是基于底线公平理论和社会保护地板层倡议,这些理论与实践共同表达了政府主导、社会共担最低保障的愿望,^③是数字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17-12/28/content_5251064.htm, 2017年12月28日。

② 李珍等:《再家庭化:基本医疗保险改革的必然选择》,《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③ 底线公平理论是景天魁教授在2009年左右提出的,他把社会公平区分为保障权利一致性的公平和保障权利差异性的公平,二者合起来共同组成底线公平。关于社会保护地板层的阐释可以追溯到2004年,全球化社会影响世界委员会在《公平的全球化:为所有人创造更多机会》中提出“必须为个人和家庭提供最低水平的社会保护,并将其无可争议地作为全球经济中社会经济地板层的一部分。”

时代内生人民性的底线要求。从具体国情出发,我国的社会保障底线至少应当包括国民年金、灾难性卫生支出保障、意外伤害保障,以及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救助等内容。首先,建议尝试建立国民年金制度。国民年金是以减少老年贫困为目标、由一般税收负担的非缴费型年金制度,为达到一定年龄的国民提供水平较低的普惠性养老金。^①我国现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具备一定的国民年金性质,鉴于此,本文建议用普惠性的国民年金制度代替缴费型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探索建立针对中低收入老年群体的普惠型国民基础年金和家计调查型国民补贴年金制度,达到一定年龄的中低收入老年人可通过所在社区申请普惠型国民基础年金,收入仍不足的可申请家计调查型国民补贴年金,从而形成更有针对性、资金使用更高效的国民年金制度,有效预防老年贫困。其次,建议建立灾难性卫生支出保障制度。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家庭医疗支出等于或超过满足基本生存支出后可支配收入的40%时,就可以判定这个家庭发生了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②灾难性卫生支出普遍超出家庭的承受能力,有必要通过社会共担来解决。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灾难性卫生支出保障制度,主要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医疗补充保险、针对低保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实现综合保障。从实施效果来看,《全国第六次卫生服务统计调查》结果显示,2003—2018年调查家庭中贫困家庭占比从4.5%上升到11.3%,在致贫原因中,因疾病或损伤致贫的比例从29.5%上升到58.5%。^③由此可见,相关政策对灾难性卫生支出的防治效果不够理想。本文建议建立专门的灾难性卫生支出保障制度,以家庭为单位参保并缴费,加之基本医疗保险结余、政府专项补贴等,共同形成灾难性卫生支出基金,确保灾难性卫生支出保障与基本医疗保险有效衔接,形成基本医疗保险满足基本医疗卫生需求、灾难性医疗卫生支出保障防范大病风险的基本格局,最大限度满足社会成员的各类医疗卫生需求,避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再次,建议建立完善的意外伤害保障制度。意外伤害保障包括针对就业群体的职业伤害保险和针对全体社会成员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职业伤害保险更具针对性,应尽量涵盖包括非正规就业群体在内的全体就业群体,无法覆盖的则通过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分散风险,充分利用大数法则使全体社会成员获得防范意外伤害风险的能力。最后,建议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采用更具普适性的精准识别机制为家庭人均收入低于低保线的贫困者提供食品券、救济金,并根据其实际需要提供必要的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满足贫困者的基本生存需要。包括国民年金、灾难性卫生支出保障、意外伤害保障、社会救助等内容的社会保障底线是包容性、基础性的兜底保障,致力于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要,是内生人民性的基本要求。

四是落实终身教育应对数字时代的知识变革挑战。内生人民性的合作互依、共建共享是建立在劳动者稳定就业基础之上的,但数字时代劳动力市场对认知技能的需求迅猛增长,工作稳定性不断下降,这就需要通过终身教育使劳动者在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都能提升技能,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要求,社会保障体系比以往更需要终身教育体系的支持。《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投资于人”。“投资

① 李珍:《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7年,第172-173页。

② 褚福灵:《灾难性医疗支出研究》,《中国医疗保险》2016年第3期。

③ 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全国第六次卫生服务统计调查专题报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29-130页。

于人”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具象化表现，也为完善终身教育体系提供了依据和方向。具体来说，需要形成政府主导、企业投资、各类教育机构服务的多元合作格局；需要建立职业风险识别机制，鼓励技能落后或所处岗位有望实现自动化的劳动者学习新技能，提高抗风险能力；需要建立激励机制激发劳动者参与终身教育的积极性，完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各类教育形式之间的相互认证，创造良好的终身教育氛围；需要重视数字技术在终身教育中的应用，积极发展远程教育，并利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赋能终身教育。通过以上方式实现国家主导—多元合作、有效整合教育资源、关注劳动者终身职业发展的终身教育体系，满足数字时代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的现实需求。

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探索非正规就业者合作社、社会医疗保险家庭联保、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底线等制度，以内生人民性逻辑形成新的团结机制，解决社会保障体系的叠加性问题，可使全体社会成员在数字时代获得体面生活的基本保障，走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内生人民性对工具理性的修正不仅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一种可能，也为破解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工具理性悖论提供了具备一定普遍意义的中国方案。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Critique and the Exploration of Endogenous People-Centered Nature in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the Digital Age

Wang Yi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As the digital age unfolds, China'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ace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Drawing on Marx's social security thought, this study argues that modern social security frameworks are driven by a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focused on capital accumulation—a logic that, in practice, leads to irrational outcomes by neglecting human subjectivity. On one hand, thi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s being deconstructed by transformations in production methods and shifts in knowledge; on the other, it continues to generate adverse consequences. Consequently,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must confront not only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nherited from industrial society but also the disruptive impacts of the digital era and their compounded effects. In response, the reassertion of human subjectivity offers a viable developmental direction. In particular, the concept of an endogenous people-centered nature—which represents a localized and inheritable manifestation of human subjectivity—provides a pathway for its comprehensive restoration. In practical terms, exploring cooperative models among informal workers may help recalibrate the prevailing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by adopting an endogenous people-centered logic, thereby forging new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s and integrated strengths for an enhanc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the digital age.

Keywords: digital ag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Marx's social security thought; endogenous people-centered nature

(责任编辑：郭 林)